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外国卷】

西方20世纪前期文学 (下)

主 编：赵沛林 仲石

本卷主编：傅景川

吉林文史出版社



- 82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外国卷】

西方20世纪前期文学 (下)

主 编：赵沛林 仲石

本卷主编：傅景川



2109.5

F9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 20 世纪前期文学. 下/傅景川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赵沛林,仲石主编)

ISBN 978 - 7 - 80702 - 890 - 1

I. 西... II. 傅... III. 文学史—西方国家—20 世纪—通俗读物 IV. I109.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372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ì · Waiguojuan

西方 20 世纪前期文学(下)

Xifang 20 Shiji Qianqi Wenxue (Xia)

主编 赵沛林 仲石

著者 傅景川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张 38.5

字数 65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702 - 890 - 1

定价 75.00(全三册)

【110. 美国文学的创世纪】

当历史迈入 20 世纪之时，酝酿、形成于上个世纪末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更以其海纳百川的态势，书写着美国文学创世纪的新篇章。

实际上，就社会的总体发展和演进而言，由于内战，美国早已开始在创建 20 世纪。在那场长达 5 年的南北战争中，美利坚投入了几乎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倾注了极大的智慧和热情，表现了各自的信仰与追求，整个民族在决定北美大陆命运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经过毁灭与再铸，造成了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战后，伴随着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经历了被史学家称之为“民族化”，“融合与统一”，“进一步规范化与制度化”以及现在被认定为“职业化”的过程。美国社会的理性认识能力和大众的认识感受能力，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大的提高。文学艺术活动，无论是专业作家的、还是大众的，都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比过去更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及特征，极有利于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经济的变革，财富的迅速积累，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实践活动、现实的物质追求、现实的创造才能的极大关注。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流入中扩大，形成美国文化格局中城市文化地位日益提高的局面，其鲜明的日常生活性、大众性，也加强着 19、20 世纪之交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在宗教、哲学及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中，尽管 19 世纪晚期美国思想领域还贯穿着基督教福音的影响，但在美国大学掌握了德国史学研究中“文献档案现实主义”治学方法的知识界，始终保持与欧洲学术界的日益渐进的联系。他们对 19 世纪中后期巴尔扎克、左拉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和认知方式，采取理解或接纳的态度。这种倾向，具有浓重的观察、重行动的实践性特征。

社会生活孕育现实主义文学，并促成它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发展自身的原因，即人们所说的各类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



展中，以入世为情怀的乡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在 19 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小说家马克·吐温（1835—1910）的创作中得到加强。他从西部幽默起步，发展成以针贬时弊为主要倾向的社会小说家，并以“镀金时代”准确概括了一个时期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马克·吐温的创作标志美国现实主义在实践意义上的发展，对包括欧·亨利、杰克·伦敦、德莱塞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具有导向作用。

现实主义不仅把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细节带入创作，以致有线通讯、电影“复制现实”、声音录制等新技术的运用，都对文学家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写作题材和风格的作家，都在这个经历重大改革的时代不约而同走进现实主义的潮流。其中在理论上卓有建树者，首推威廉·迪·豪威尔斯（1837—1920）。

豪威尔斯主要创作于 19 世纪后期，以近四十部长篇和短篇小说集，以及大量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著述赢得声誉。他曾主编重要文学刊物《大西洋月刊》，影响文坛，奖掖后辈。针对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中背离现实、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倾向，他提出“只有在现实中才有真实”的观点，强调以“朴素、自然、真实”为创作原则，主张抛弃浪漫主义作品中“异常巧合和感伤的结局”，通过观察，用美国人都熟悉的语言，不多不少地忠实描写由普遍动机和情感所支配的男女，以符合“单纯”、“温文尔雅”的审美趣味。豪威尔斯提倡现实主义，并有明确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因此被看成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但他往往从道德角度去理解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虽然他也强调应当避免通俗作品陈腐的道德观），以至把劳资冲突也归之为“观点上的分歧”，认为富有者的“良心发现”，“改变观点”，会使阶级矛盾迎刃而解。在“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指导下，他给小说规定的任务是，通过描写“微笑的美国”，来加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增强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他的批评文章和小说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似乎代表了中产阶级道德节制，以至道德自律的一种方式。

豪威尔斯倡导现实主义，时逢战后美国南部恢复创伤和西部开发建设时期，具有自由竞争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似乎给人们展示了乐观的前景。民主、自由的理想余辉尚存，初起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染上了这种乐观、雅逸的情调，文学史上故有“微笑的现实主义”之称。同时它在传播现实主义的影响，推动普通美国人在心目中确立文学的价值方面，也是有成就的。

如果站在一种文化角度上来看,豪威尔斯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文学,其最广泛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文化形态,而是以多种文化形态来确立自身的地位的,而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其各自与众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主张,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一种强调正统、高雅的传统,亦称纯文学文化。这种文化的渊源与殖民时期的宗主国——英国绅士文化有关,后在新英格兰的文化土壤中得以繁衍。19 世纪后期的波士顿成了美国高雅文化之都。连声名很高的豪威尔斯,也将自己对波士顿文化圈的访问卑称为“谒见”。可见,高雅文化传统对于一般人该有怎样的吸引力。高雅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大都具有贵族世家,或中产阶级以上富裕、有闲适、有修养的家庭背景。他们持有贵族的审美情趣和道德追求,但又不满贵族行为方式的浮华和矫揉造作,因而他们杂糅资产阶级贵族的生活习俗,培养起一种“准贵族”式的雅趣与逸志。他们对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缺乏必要的关注,却对欧洲文化表示了某种向往和崇敬,其中大多数人都有旅居欧洲的文学生涯,在美国文学史上常被称为“旅外作家”。

这一时期影响极大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是高雅文化传统的主要倡导者。他所体现的创作倾向,在 20 世纪被称为“斯文传统”。詹姆斯曾受惠于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但他长期侨居欧洲,又深受长兄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的影 响,其艺术信条主要借鉴于绅士文学,以及感伤主义心理分析小说的传统。强调描写超越地域和国家偏见的心理和道德探索题材,以心灵真相取代社会世相,张扬艺术创作旨在实现崇高的道德归宿的集体伦理观,追求写作的大家手笔。事实上,詹姆斯一生都在寻找像他那样一个文化修养很高,奉守既成传统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家庭,并视之为模范社会的缩影。他为数众多的小说,形象地记录了他对自己的艺术理论孜孜不倦的实践,刻画了人物最细微的心理波动,因此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伊迪丝·华顿是 20 世纪初心理和道德探索的重要代表,高雅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之一。她曾师承詹姆斯,求教于欧洲文化,讲求作品的高品位,重视文体的典雅。与詹姆斯不同的是,她对美国的民族特性没有太大的好感,对美国平等社会的神话批判多于肯定。其作品较少实验性痕迹,文笔清新流畅,没有遇到过曲高和寡的尴尬。美国批评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华顿的小说体现了 20 世纪初期出现的新文学类型的稳定、融合性特征,即把高雅文化的纯文学机制与适应广大读者的市场需要统一起来的努力。



20 世纪头 20 年心理和道德探索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威拉·凯瑟。她早年相信“为艺术而艺术”，崇拜詹姆斯小说写法的“精彩”、“完美”，写了一些短篇小说，表现了细微的心理变化。后受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裘威特的影响，努力寻找和表现“自己安稳的生活中心”。她执着于表现早期拓荒者的精神和人格力量，从中挖掘深刻的心性和道德力量，以此表明自己对美国社会的商业化和腐败风气的不满。凯瑟没有贵族大家的身世，也没有欧洲文化的背景，这是她与詹姆斯、华顿的不同之处。于此，也使她的小说少了一些绅士的闲情雅趣。但她在文化教养方面仍属传统的贵族化教育。她在创作中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越来越重的怀旧情绪，以及典雅平实的文风，基本归属于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高雅传统。

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与高雅传统并行不悖的是城市平民化倾向。19 世纪后期，城市人口剧增，平民队伍扩大，相应改变了美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格局，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对广阔社会生活进行真实描绘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应该表现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的声音。伴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扩张的大众新闻报刊，极大加强了这种倾向。大众新闻传播媒介把文学创作与阅读引入城市日常生活，使文学以最快捷、最简易、最通俗的方式与大众见面。一批平民出身的小说家，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有所作为的。如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厄普敦·辛克莱、杰克·伦敦和西奥多·德莱塞等，其中最典型的则是欧·亨利。

欧·亨利的小说创作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短篇小说）都是先发表于报刊杂志，后结集出版。其创作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城市平民化倾向，因此引起过广泛的争议。然而，要说欧·亨利的创作使美国短篇小说真正具有现代性，这几乎是没有人提出质疑的。

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时代意义的，是社会批判倾向的形成和发展。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主张，曾将温情与微笑带入文学。但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宣告了“美国例外论”的终结。欧洲发生的动荡不安，依旧在美国出现，而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客操纵选举，民主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贪污腐化猖獗，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当局概莫能外；城市贫民剧增，抗议声此起彼伏；农村粮价低贱，信贷紧缩，加剧了农民的破产，整个社会充满危机。1898 年，美国发动了旨在夺取西班牙殖民地的美西战争，从此再也没有哪一次国际性的重要战争没有美国介入，这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正视现实

的作家们再也无法“微笑”，他们变温情为严峻，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倾向因此而显露。这种批判倾向上承马克·吐温，下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抗议小说，在世纪之交出现了被德莱塞称为“美国现实主义之父”的亨利·莱克·富勒（1857—1929）。而在 20 世纪初则发展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由文学界、新闻界发起的抗议运动，史称“黑幕揭发者”创作的“揭丑小说”。这场运动始于 1901 年，以《论坛报》为首的一些报刊，不满统治当局与垄断公司的相互勾结，刊登大量文章，披露联邦政府、地方自治机构和立法机关的营私舞弊，报道公开的诈骗和隐蔽的勾当，几年内席卷全国。鉴于其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性质，罗斯福总统贬称其为“黑幕揭发者”。这一称呼得到了人们的确认。1911 年，该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将大批作家裹卷进去。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小说家辛克莱等人先后写出《城市耻辱》（1904）、《屠场》（1906）等力作，揭露资产阶级政客制度的腐败堕落，谴责物质主义对政界以至整个社会的腐蚀，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出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黑幕揭发者”的成员追求的目的不同，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也高低不一，但作为整体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揭丑小说”继承了 19 世纪末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存在艺术上的明显差别。

与“揭丑小说”原色相近的“社会问题”小说，同是对官僚政治和资本对现实的“创造性毁灭”的反映。学者作家罗伯特·赫利克（1868—1938）为“社会问题”小说的卓越代表。他于 1900 年发表《生活之网》，反映了控制和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金融界的内幕。1904 年出版的《共同的命运》写一个钱迷心窍的工程师建造房子偷工减料，结果房塌人毁，既损人又害己。赫利克最好的小说《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1905）表现了类似《屠场》的题材与主题。

20 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支力量则以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的创作为代表。杰克·伦敦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步入文坛，他的创作风格粗犷、冷峻，笔力雄劲，有力冲击了影响美国文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浮华文风。20 世纪初，他发表《马丁·伊登》等一系列具有深刻社会悲剧性的现实主义力作，掀开了描写美国理想幻灭的文学序幕。德莱塞的创作起步于 20 世纪初，早期作品已经具有鲜明的批判倾向，他在 20 年代的创作，则标志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111. 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

1865年7月，美国颇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大西洋月刊》予以一位年轻作者特别的关爱，破例地刊用了他的一篇习作《一年的故事》。小说对一位涉世未深的姑娘进行了细微的心理分析。她的恋人在南北战争中阵亡，致使她蒙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大西洋月刊》此举的背景是什么？至今人们尚不十分清楚，但可以确定，这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美国现代小说之父”的亨利·詹姆斯（1843—1916）跻身文坛的起始。

亨利·詹姆斯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对其创作造成了终生影响。如果说，腰缠万贯的祖父使他豪居纽约，生活得富裕、闲适，作为宗教哲学家的父亲则教会他用心去感受、体验和静观周围的生活，尤其是父亲的忠告：严肃而不阴郁、志高而不入俗，成为他终生实践的精神和道德信条。而这一切同长兄威廉·詹姆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对他的影响相比，却又稍显逊色。19世纪中后期美国知识界的几位泰斗：哲学家爱默生、瑞甫利，教育家艾可德经常出入詹姆斯家，更使他受到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的熏陶。但有意思的是，詹姆斯一生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先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后随家旅居欧洲，领略瑞士、法国、德国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多种语言，几年后重返美国，定居于新英格兰的剑桥，与之毗邻的是以文化积淀厚重著称的康科特。极有可能是受19世纪中期康科特村浪漫派文人传统的影响，后来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律专业的詹姆斯却潜心于文学创作，并在习作中表现出传奇小说的某些特点，如多采用古怪、神秘的叙述口吻，带有对巴尔扎克、霍桑等早期创作模仿的痕迹。但正如豪威尔斯所说，詹姆斯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明，他在小说与霍桑和乔治·艾略特一脉相承，其创作是一种以追求心理真相为目标的文学。

作为一个文化修养很深的年轻作家，詹姆斯是带着自觉的文化意识进入文

坛的。在习作阶段,他尝试着运用身边的各种题材,但总感到不足以负载小说的文化使命。他也羡慕老一辈作家能得心应手地利用所及的生活材料。在他看来,“要有一个古老的文化,小说家才能动笔”,“小说家靠的是风俗、习惯、惯例、习性、形式等等成熟而确立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他写作的素材”。而这些,正是美国所缺乏的。于是,欧洲便成为他从事小说写作的选择之地。后来,詹姆斯作为一个旅外作家,曾引起美国文坛的非议,原因正在于此。

1869 年和 1874 年,詹姆斯两次赴欧洲寻找创作的立足之地。在法国他结识了屠格涅夫、左拉、都德和福楼拜。屠格涅夫等人的创作经验使他受到启发:写小说先不要担心故事情节,应专心写好人物。经过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巴黎生活圈还不是小说创作的理想之地。法国作家的“悲观色彩过于浓厚,写的是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而英国的文化生活氛围较为适宜文学创作,伦敦是“人文荟萃之区,全球最完备的缩影”。发表于 1871 年的《一个热情的旅行者》,便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种创作选择。作品广泛描写了英国社会生活的情景和习俗,表现了美国人克莱门特·西尔在英国的追求、感受和各种际遇。他视英国为自己的精神故乡,羡慕它的历史悠久,充满传奇色彩,渴望从中获取满足自己浪漫幻想的材料。西尔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反映了作家所关注和着重表现的领域,这构成了他一生创作的主要特色。自 1875 年起,除了四次回国探亲,詹姆斯大部分时间住在伦敦,并多次赴欧洲其他国家作短期旅行,他的大多数小说,也以欧洲生活为背景。

但是,创作基地的选择并不等于对欧洲精神文化的全盘接受。从道德与人格上看,詹姆斯始终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美国比欧洲纯洁。尽管他对美国的实际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既不像同时代的豪威尔斯那样热心描写美国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像后来的杰克·伦敦、德莱塞那样表现“美国的悲剧”。描写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表现他们在异域精神文化冲突中的各种心理情绪,是这位作家倾心的题材。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个人道德素养的浓厚兴趣,尤其注重“自由精神”。他认为作家不可能无所不知,因此,不应追求对生活的全面描写,而应将笔力集中于一个有洞察力的人物,将其在各种境遇中的心态,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出来,以表现“美德”克服邪恶,感化人,平复矛盾的“点化力量”。他的小说创作正是这一艺术主张的自觉实践。作品专事描写有教养的闲逸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心人物多半是富翁巨贾、绅士淑女或崇尚修养的艺术家,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背景,故有“国际小说”之称。



中篇小说《黛西·密勒》(1879)是詹姆斯成名之作。它描写性格开朗、热情单纯的美国姑娘密勒罹难于世俗观念的悲剧。与作家笔下一系列生活在欧洲的美国姑娘相似,她崇尚自由,追求精神独立,随母亲与弟弟旅居欧洲,在瑞士结识了美国青年温特博尼。后者觉得她一点也不熟悉欧洲社会的处事方式和习俗,并为她的单纯和她的母亲——一个来自纽约的新贵妇人的冷漠感到惊讶。两人言定在罗马再次相会。可是温特博尼到罗马后并没有如约先去拜访密勒,而是会见一位久居本地的意大利朋友吉多瓦尼利,恰在那里与密勒相遇。调皮的密勒故意拒绝温特博尼的邀请而与吉欧瓦尼利早出晚归,四处游玩,遭到世人非议,连吉欧瓦尼利也觉得她行为“过份”。但密勒任性地蔑视议论,最后死于时疫。她去世后,温特博尼才感到,密勒身上具有值得他尊敬的品性。正如吉欧瓦尼利所说:“她是最天真无邪的,因而也是最自然的。”

多年后,詹姆斯在这部作品再版时指出,吉欧瓦尼利所强调的“自然”,是对密勒本质的准确概括,是理解她的性格和行为的关键。她本身是一件自然作品,而不是人造艺术。在有些人看来,密勒任性、乖戾、有意向俗约挑战,其实,她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追求精神自由,这是符合逻辑、顺应自然的。密勒的行为并无越轨之处,但却引发了欧洲古老的贵族文化风尚同美国单纯的行为处事态度之间的矛盾。她的死与其说是疾病所致,不如说是这种矛盾导致的心理摧残。作者力图对她的品德教养作出公正评价,并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隐秘的感情,因为这一形象的生活原型,正是詹姆斯早年爱恋而后不幸夭折的表妹坦布尔。

詹姆斯对自己的“国际题材”小说曾有过不无幽默的贬抑,但并不影响他一直采用这样的题材进行创作。从生活经验和艺术追求来说,这是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文化修养和见解的题材领域。与此同时,詹姆斯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文学艺术家的小说。这些作品大多采用虚构寓言小说的形式,描写生活现实与艺术现实之间的冲突,表现作家、艺术家不可避免地面面对美学与道德选择的难题及其进退维谷的处境,具有浓厚的讽喻色彩和喜剧风格,其中不乏有关艺术本质和创作过程的真知灼见。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带有作者创作生活的印记。《“拜尔特拉弗奥”的作者》中的马克·安毕恩是一个严肃的文学作家,他在创作生活中饱尝艰辛,却不能成为一个普遍受人欢迎的成功者。《中年》(1917)中的邓库姆,也许比作家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更能表现出他的内心世界。邓库姆以健康为代价,耗尽心血创作了一部作品,因而患了一场重病。

大病初愈，他翻阅着刚刚出版的作品，心潮起伏：艰难一直纠缠着他，但他认为，仅此而已，也许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注定要与各种艰难困苦打交道。邓库姆的作品征服了一个青年医生，他不惜放弃经济利益，细心照料作家，帮助他恢复健康。但邓库姆得到的最大安慰是，他坚信自己能够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尽管他意识到时间对自己来说是十分有限的。小说以下面一段文字表达了主人公，当然也是作家本人执著于艺术的心声：“除了艺术家，再没有人能这样：我们在黑暗中工作，尽我们的力所能及，给予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情绪，而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工作，其余的是艺术的疯狂。”

詹姆斯的后期创作更注重通过内心隐秘的戏剧化，造成富于艺术张力的模糊性，以达到“思想的完美之境”。发表于 1902 年的《鸽翼》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作品中的伦敦新闻记者邓谢尔与富有的投机家的女儿克洛伊是一对私订婚约的情人。由于邓谢尔没有什么财产，克洛伊并不愿意嫁给他。在邓谢尔赴美国从事新闻报道期间，克洛伊的姑母邀请旅居欧洲的美国姑娘塞尔和她的监护人斯坦因海姆太太来家作客。塞尔慷慨大方，聪明可爱，却一直蒙受疾病的折磨，与克洛伊相识后，便视她为自己可信赖的朋友，但克洛伊却暗自设置了圈套。她得知塞尔不久于世，便教唆从美国返回伦敦的邓谢尔先去追求塞尔，以便很快成为塞尔的财产继承人，那时他们再兑现婚约。天真单纯的塞尔以为邓谢尔真心爱恋自己，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幸福。但不久，一个被克洛伊捉弄过的绅士将真相告诉了她。塞尔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塞尔死后，邓谢尔虽然得到了大批遗产，但也受到良心的谴责，终于与克洛伊分手。

《鸽翼》在詹姆斯的后期创作中，保留了一定的道德探索色彩。塞尔的纯洁与悲剧，克洛伊的奸诈与阴谋，邓谢尔的自私与软弱，都有明显的道德含义，这在作家以往的创作中，是开拓主题的绝好材料。但现在，作家的侧重点有了变化：对精神和道德素养的关注演化成繁复的心理活动的探测，判断善与恶时用心理标准代替了伦理标准，欧美文化冲突的主题和国际背景已经不那么突出，对社会环境和人物行动的描写更加淡化。语言上则多采用副词重叠一类冗长复杂的句子，细针密线地描写人物戏剧性的心理变化，或以对话探测内心隐秘，或在心理意绪上互相“启示”和“暗示”，形成多重心理层次的交错。詹姆斯之后发表的《使节》(1903)、《金碗》(1904)两部长篇小说，都具有



以上明显特征。不过，实际生活中的詹姆斯比他笔下的人物要更重视外部行动。1910年至1911年间，他最后一次返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移居伦敦，情绪亢奋地参加战时活动。1915年入英国籍，临终前获英国功勋勋章。

詹姆斯创作颇丰。就小说而言，除了以上所提及的，还写有《贵妇人的画像》（1881）、《波士顿人》（1885）、《波英顿的珍藏》（1886）等名篇。由他自己精选的《全集》，同时收入了不少游记和剧作。附在《全集》中的十八篇序言，收集成册后改名为《小说的艺术》（1884），总结性地论述了他的创作思想、艺术方法和关于形象思维过程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谈及一些主要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其他评述多为早年所作，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却也有一些平庸之见。

詹姆斯的创作在文学史上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的作品离美国实际生活较远，艺术视野狭窄，不过是抒发闲逸阶级的情绪。有的看法则褒誉他为“文学之神”，描写优美的良知的史学家。的确，詹姆斯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缺乏必要的关注，过于超然于最富有生机的普通人的生活。特定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使他选择了对有教养阶层的精神世界进行细微描绘和文化、道德评价的创作道路，这是他反映现实的独特角度，尽管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认识上的偏狭。正如当代美国文学家R·E·斯皮勒所说：“亨利·詹姆斯造就了作家的自觉自我，通过自己的感情发现了测定经验的最终尺度；他把现实主义艺术的土壤从外部世界移向内心世界。”他对心理因素的重视，以及刻写内心生活所采用的新文体，虽有做作、冗繁之嫌，但并无怪诞、反常之弊，成为20世纪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最早的范式，并助长了20世纪文学的内向化倾向。从1943年为他举行的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以来，詹姆斯的影响持续上升，至今仍被作为开创心理分析系统的“文学大师”，受到西方文学界的普遍推崇。在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家的创作中明显地反映了他的重要影响。

【112. “高雅”文学的女性代表】

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亨利·詹姆斯以“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著称。而其追随者中，伊迪丝·华顿（1862—1937）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不为人们普遍熟知的代表人物。

华顿有着与詹姆斯相似的家庭环境和旅欧经历。这个原名为纽博尔特·琼斯的聪慧女性，生于纽约名门望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南北战争后期随双亲旅居欧洲，主要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十一岁后返回美国，先由家庭教师指导，在藏书丰富的家庭图书馆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产生了文学创作兴趣。十二岁练习写作，四年后出版诗集，与此同时的赴欧求学，使她真正以一种自觉的文化视野来观察欧洲传统，当她再度回国时，已是成年的知识女性。凭着文化修养和风姿上的优势，她踌躇满志地出入于文化和社交界，却也埋下日后婚姻生活不幸的伏笔。1885年，华顿与银行家爱德华·罗宾斯·华顿结婚，但妻子从丈夫的不苟言笑和精于打算感受到的主要是虚假做作、平庸浅薄。夫妻情趣不合，婚姻失败，文学创作便成了她感情生活失意的唯一精神支撑和寄托。最初，她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大多以欧洲为背景，表现艺术家所经历的伦理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尤其透视他们在困境中的心理“激荡”，具有亨利·詹姆斯式的立旨、笔法和处理题材方式。《恢复》中的画家认识到，他要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必须超越他的本土——美国的背景。《判断》表明了这样一种道德意义：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纯洁自我比掌握技巧更重要。《粗制滥造之作》出现了詹姆斯式的艺术家小说的冲突和情节：严肃文学作家的创作与一般读者的欣赏水平和情趣存在重大差距。而《最后一笔财产》则在国际背景上表现了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欧美文化冲突。不少文学批评家认为，就早期短篇小说而言，仅仅指出华顿的创作与詹姆斯类似，实在有屈于前者。他们指出：虽然华顿明显受到詹姆斯的影响，但她的优



秀短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叙述技巧，作品中的心理和道德色彩并不像詹姆斯的作品那样浓重繁复。

伴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华顿产生了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冲动。这一方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她摆脱了单纯的模仿，初步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具备了“写大书”的创作能力。同时，短篇小说的问世并没有引起重要反响，也是促成她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真正为她赢得重要文坛声誉的是第二部长篇小说《快乐之家》（1903）。作品主人公李莉·巴特生于纽约一个日渐衰败的望族家庭。她聪明伶俐，长相迷人，一心要嫁给有地位的富人，择偶十分挑剔，直到二十九岁尚未婚配。在一个家庭晚会上，她参加赌博，输给赌场老手特里洛尔一大笔钱，却无力偿付。特里洛尔对她进行恐吓，从中寻找乐趣。百般无奈，巴特只好假意应允偿还，实则一走了之，到了瑞士，在富有的多尔塞家当管家。多尔塞太太是专以奚落别人为快的刁钻女人，她一手策划了恶作剧的晚会，当众羞辱巴特，迫使她含泪离开一心要进入的上流社会。后来，姑母去世，巴特继承了她的遗产，但已是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她吞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死于异国他乡。巴特死后，她的旧情人塞尔登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她继承的那笔遗产，她留下遗嘱，将它用于还债。小说写了一个令人感伤的悲剧，具有鲜明的精神和道德探索色彩。在作者看来，天真文雅的巴特要找一个既有钱又中意的丈夫，动机虽然算不上高尚，却也无大错。而唾弃她的欧洲上流社会对这样一个弱女子百般无礼，甚至以“接受男人的津贴”、“勾引有妇之夫”的罪名破坏她的名誉，导致她身心受到折磨，自杀而亡。上流社会对她的死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作品道德评判的点睛之笔在于，作为受害者（既受毒害、又受迫害）的巴特，临终前还想到用仅有的遗产还债，她比嘲笑、羞辱她的那些人要纯洁得多。《快乐之家》是华顿为庸俗、势利的社会现象绘制的艺术画像，巴特的悲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和警世意义。作家的艺术笔触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上，但包括经商商、风俗等具体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也是构成作品现实主义总体特征的重要因素，这在华顿的整个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1907 年，移居法国的华顿与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这种影响在中篇小说《特莱梅夫人》（1907）、《暗礁》（1912）和《乡土习俗》（1913）中代表了作家创作的一种特色，即表现婚嫁法国的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习俗和家庭伦理传统的冲突中所经历的矛盾和痛苦。《特莱梅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

“忠贞”与“诚实”的理解，不同于她身边的法国亲友。《乡土习俗》是作者的另一部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出现了类似詹姆斯笔下的“国际题材”。活动其间的女主人公斯普拉格来自美国中西部，她带着野心和“俗气”闯入纽约上流社会，先后嫁过三个男人。第三个丈夫是个软弱的法国贵族，象征着中西部的“庸俗”吞没了东部上流社会的“温雅”。对于饱受贵族文化传统熏陶的华顿来说，这是一个感情上不愿接受的事实。

在以上作品中，华顿表现出对心理领域的更大关注，相应淡化了人物社会行为的描写。用某些西方评论家的话来说，她像一个画展的向导，本来是要将绘画中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内容介绍给观赏者，但对心理内容的偏爱，使她把自己的兴趣强加给观赏者，这固然能够显示出她的内行和文化修养上的优势，但也不容易使普通观赏者真正投入。这种与詹姆斯“类似的预想，类似的题材”，主要反映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绅士”传统，自然是和者盖寡的。相对而言，同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1911），更能博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故事发生在马萨诸塞州一个破产的农场，由一位中年工程师讲述。农民弗洛美的妻子齐洛比亚，是个絮絮叨叨的邋遢女人，成天奇思异想，离不开江湖医生配制的药物，致使弗洛美苦不堪言，无处诉说。后来，齐洛比亚的表妹西尔弗来到农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西尔弗的勤劳善良深得弗洛美的好感，两人产生了感情，引起齐洛比亚的妒嫉。一年后，齐洛比亚以更换女佣为由，撵走西尔弗。弗洛美被迫驾雪橇送西尔弗前往车站。路上，两人不能忍受离别的痛苦，有意让雪橇撞到榆树上，但自杀未成，却造成终身残废。在齐洛比亚的勉强支撑下，农场得以惨淡维持，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生机。《伊坦·弗洛美》一反华顿创作中一贯采用的上流社会背景。第一次直接、具体地描绘了下层社会的生活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一个新的角度更真实地展示了社会风俗、传统道德规范同人的精神追求的矛盾冲突。作品的结局带有神秘的宿命论色彩，加重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同时表明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困惑。在华顿的创作中，这种困惑与某种感伤的浪漫情调相伴共存，它既可以引发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也表现为《乡土风俗》中那种对逝去的文化氛围和道德风尚的怀念。

1917 年出版的《夏》是《伊坦·弗洛美》的姐妹篇。作品中来自新英格兰的姑娘，不堪忍受村镇生活的平庸逃回东部都市，却又误入歧途，参加了颓



废派组织的非法活动，终于导致自己的毁灭。小说裸露的批判意识，将《伊坦·弗洛美》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表现得更加鲜明。

《纯真时代》（1920）是战后华顿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青年律师阿切尔即将与未婚妻韦兰成婚之时，结识了韦兰的表妹奥伦斯卡。奥伦斯卡是伯爵之妻，虽与丈夫感情不合，长年分居，却碍于天主教习俗不能离婚，为此，她已招致不少的非议。阿切尔在精神与气质上都与他生活的那个社会不同，他从奥伦斯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渴求的自由精神，两人渐生爱慕之情。但阿切尔迫于礼俗不能解除与韦兰的婚约，只得按约与她成婚，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奥伦斯卡移居华盛顿，不久，为照顾姑母再次来到纽约，与阿切尔旧情复萌，可是得知韦兰已有身孕，她再也无法忍受，断然离开，移居欧洲。多年以后，韦兰去世，阿切尔带着儿子到巴黎旅游，奥伦斯卡邀他前去相见，但他拒绝了，觉得最好还是让奥伦斯卡的美好形象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小说被认为是华顿结构技巧最好的一部作品，上流社会“温雅”的生活氛围和情感世界，都得到集中表现。詹姆斯主张通过某个有“良知”的典型人物，表现“美德”克服邪恶，感化人，平复矛盾的“点化力量”，在这里再次付诸实践。当然，这种美德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不过是纽约上流社会贵族文化羽翼下的道德伦理观，它与19世纪后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风尚有着血脉上的联系。作品发表后，获普利策奖，这是华顿创作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20年代以后，华顿的创作进入后期。长篇小说《月亮隐现》（1922），包括《虚假的拂晓》、《老处女》、《情郎》、《新年之际》等四部中篇在内的《昔日纽约》（1924），反映了19世纪40到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生活。《母亲的回报》（1925）、《昏睡》（1927）、《孩子们》（1928）等作品，主要表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1929年发表的《汉森河的托架》，表现了中西部文化习俗与纽约上流社会生活传统之间的冲突。在这之后出版的《楼座观众已到》（1932），则反映了英国与新大陆在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方面的矛盾。以上作品的题材和旨意，同华顿的前期作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文笔和韵味却逊色于前期作品。

在华顿的后期作品中，文学论集《小说创作》（1925）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她认为，“每一部伟大的小说，首先必须有深厚的道德观，然后用古典主义的统一和简洁明快的手法发展起来”。作者必须“处处记得他的职责不在设